

司徒華、李百強訪問

日期：2009年3月25日

時間：下午2:45 至 4:40

地點：教協8樓

受訪者：司徒華先生(華)、李百強先生(李)

訪問者：梁操雅博士(梁)、英冠球博士(英)、劉思詠小姐(劉)、陳嘉欣小姐(陳)

英：多謝兩位接受訪問，第一個問題是想問為什麼你們會選擇入讀葛師？

華：我在中學畢業之後，自己有三個志願：第一個志願是讀工專，即是現在的理工大學，做無線電的發報生，因為這樣可以上船航海，到其他地方去。一方面可以到各個地方，了解各個地方的風土人情，另一方面也想到在船上是比較靜，對自己的自修是有好處，而我當時自己的志願是當一個作家。但是工專要讀兩年，同時是要交學費，但我的家庭已經無法負擔，所以選擇第二志願，入讀師範。而當時葛師剛剛成立，一年制，羅師是二年制，我也選擇了一年制，希望可以快些畢業。當時選擇師範並不是對教育有甚麼深切的認識，而只是覺得一方面是為了生活，教師的入息算是不錯，比較安定，同時也想到，教師有比較多的業餘時間，有利於自修。假如考不到師範，我就會到政府當文員，幸好考得上。進了師範，特別是出來教書後，才對教育有深切的了解，所以一教就教了四十年，是我一生唯一的職業。

李：司徒先生的生平有一部份寫在我們辦的雜誌《新教育》，這次訪問可作補充，而且所說的也比所載的更為詳細。

梁：我有一個跟進的問題，當時的社會背景是怎樣的，為什麼會有葛師的出現呢？

華：我相信你們會比我了解，幾間師範的開辦大概都與政治背景有關。首先是羅師在戰前成立，當時國內被日本軍國主義侵略，國內人大量逃到香港，所需學校和學位比較多，要接收這些流亡到香港來的人的子弟，所以開辦羅師。到1951年開辦葛師時，亦看到中國大陸色變，從國內來的人更多，在這時候，政府也準備要擴展官校及津貼學校。因為在此之前，新界所有學校都是津貼的，但市區只有很少，大概是兩、三間，官立學校亦都不多，那時政府覺得要擴展教育，特別是要收容從國內逃來香港的人，所以開辦葛師。再看看柏師，是在1961年開的，大家也知道，在1959-61年，中國大饑荒，大批的越過深圳河逃到香港，聽說當時有十幾二十萬人之多，香港政府就採取「抵壘政策」，即是來到市區就不把他們遣返，其實這還有一個原因：因為香港要

發展工業，吸收這些人作為廉價的勞動力，去推動香港的工業發展，這些人來到香港就自然帶來一批要讀書的小孩子，所以就開辦了一年制的柏立基師範，這是我的理解。至於後來為什麼幾間合併成為一間教育學院呢？這又與回歸有關，你們比我更加清楚。

李：司徒先生說出了經濟、社會與政治的因素，我想說一下有關教育的因素。那年代學童很多，適齡的與超齡的，政府大力推行小學免費教育，鼓勵宗教、慈善團體辦理津貼小學。在1953年開始，將學校變為兩間，即分為上、下午班，於是對教師的需求大增，葛師就在那年度開始膨脹得很快。

華：在政府尚發展津貼小學的計劃之前，當時官立小學很少，所收學費也很便宜。津貼小學多在新界開設，因為要照顧原居民，在開辦葛師的時候，政府已經有十年發展官小的計劃，是準備陸續多辦官立小學，官立小學所收的學費不記得一個月只是2元還是5元。後來到57、58年都開了105間官立小學，包括了上、下晝班在內。到了60年代初，政府想到光是辦官校，成本很貴，要建校舍，支付老師的待遇還要準備退休金等。所以想到一個便宜的辦法，就是開辦津貼小學，但為了減少建設學校的經費，因為開辦一間校舍最重要的是建校，而這時候政府剛剛推行興建徙置大廈，於是利用徙置大廈的地下，來辦津貼小學，一直發展至大概73年，政府決定實行6年免費教育。

李：除了在徙置大廈的樓下、天台辦學以外，亦容許各類社團自己辦學，如天主教會、基督教會、東華三院等等，在60-70年代有很多徙置大廈建成，初期是I型、H型等，很多不同的類型的校舍建築，就像司徒先生任小學校長的，只有9班，規模大的有十幾班，甚至廿幾班，有些補助、津貼小學就在天台辦學...

華：在天台辦津貼小學，全都是私立的，政府以廉租租予私人團體去辦私立小學，因為當時的津貼小學是在地下開的，在徙置區地下的開的津貼小學不能滿足入學適齡兒童的需要。

梁：很多謝司徒先生提供一個全面的圖畫給我們，我想跟進一下，因為我不了解一些學校的性質，在灣仔有一些學校，譬如端正、敦梅、梅芳等，他們本身是中小學也有的，譬如中國兒童書院等，那他們是甚麼性質，在這方面辦學者作了多少貢獻呢？

華：這些都是私立的中小學，當時由於政府辦的學校，包括津貼、補助，補助的當時只有13間，他們與津貼小學是不同的，譬如華仁、聖約瑟、聖瑪利這些都是補助學校，但他們都只開辦中學，他們的小學都是私立的，如女拔萃小

學就是。而你所說的私立小學，它們可補足那些進不了官立、津貼、補助學校學生的需要。在戰前，香港幾乎絕大部份都是這些私立的中、小學，即使在戰後大部份都是，但所收的學費是相當貴的。記得太平洋戰爭結束，和平之後，我回到香港；當初想考德明的，因為我在走難時在國內完成初中，可以進入高中一，但我記得它當時所收的學費不知道是45元還是50元一個月，但家境沒法負擔這些的經費，我便去投考油麻地官立書院，它只收5元，這就是不同之處。

梁：這點我也有同感，因為在58年的時候，我正在東院道讀官立小學，當時學費只是5元，而且之前我在中國兒童書院就讀時，就不大清楚學費是多了。不過一定比官立貴。我們試換一個話題，司徒先生是葛師第一屆，而葛師在英皇也有一個校址，後來才搬到加士居道，兩個地方的學習環境是怎樣的？當時的同學也是否因同樣的背景而去師範學院讀書呢？

華：英皇不是葛師的校舍，只屬借用，所以當時的上課地點、課室是非常不理想。我們一屆有60人，借一個大禮堂來上課，同時只是上上畫的課，那下畫就空出了一段時間，一直到四時多五時，羅富國教育專科學校放學後，我們就借用他們的課室去上選科，和上那些導修課，那時上午的我們分科設小組，即是小組討論。那是非常不便，上完課還要等到下午四、五時。當時我住在九龍，往來不方便，所以午飯後就到馮平山圖書館看書，一直等到四、五時才去羅師上課。當時很多老師擠在同一個教員室裡面，十分不便。我記得當時英皇的校長叫Sargison，他十分嚴苛，每天早上都在學校門外守着，看看那些不穿校服的學生，就處罰他們。我們葛師自然不會穿他們的校服，我們有幾個同學竟也被他抓去罰了。而其他的活動更因沒有地方，無法進行。

李：司徒先生所說的羅師，就是在般含道的舊校址。

梁：葛師是不是有校服的？

華：當時未有，一直到1952年，校舍建好後我們搬回那裡上課。為要舉行開幕禮，由總督葛量洪親自剪綵，那時候我們才訂製校服，而校服也不過和中學一樣，是藍外套、灰褲，外加一個校章；那個校章是很貴的，當時要20元一個的。

李：那是銀質的，銀的成份很不錯，用久了會變黑的。

梁：那校徽有沒有甚麼意義在內？

華：校徽是葛量洪總督自己的家徽。不過很有意思，家徽上有「Onward」一字...

李：Forward。

華：「Forward」，我們就譯作「勇往直前」，都蠻有意思的，當時的人叫這像雞的校徽作「俚雞」。

梁 我也想請教一下李先生...

華：他比較特別，他是從澳門過來的。

李：我中學時期在澳門渡過，先父是做教育的，所以有一點影響，而我又是家中唯一的男孩，不想離家太遠，所以來香港讀書，選擇了師範，一考就考上了，所以接受師範訓練，出來教書，結果一生從事教育。

華：我想補充一點，我考入學試的時候，是羅師、葛師、鄉師一起考的，是在英皇書院的大禮堂考，幾百人在一起，考的科目有很多，除中英數之外，還要考物理、化學、歷史、地理，題目是一樣的，我記得中文的作文題目有兩條，二選一：一條是《教然後知困》、另一條就是《教育即生活》，我是選擇了第二條的，當時我也有接觸過這一類書籍，我就引用了杜威的教育理論去寫這一篇入學的考試題目。因為當時英文書院畢業的，多數是考羅師，而中文畢業多數考葛師，或者鄉村師範，爲了照顧兩種不同畢業同學的水平，所以英文題目是很淺的，但數理化史地則是頗深的。

李：這方面我可以補充一下，當時大陸有很多中學畢業生，或者是中學已經畢業而且工作了好幾年的，甚至也有在政府的機構做文員的，有的或者覺得教書有意義、收入較穩定、薪酬好一點，所以很多人轉考師範。我們那班同學當中，我是適齡入讀的，但有些同學是三十、三十多，甚至四十歲也有，考試時真是濟濟一堂。而我們與司徒先生就學情況不同的是，我們已經有葛師的校舍，但是校舍的禮堂很小，需借用培正中學來考入學試，它的禮堂很大，可以容納很多考生，而且要考很多科，但當時加了一張新卷，就是智力測驗，有很多圖表，我相信這也是一份很重要的試卷。

華：我記得當時有60人，20個男生、40個女生，因爲要按照學校男女教師的比例1:2來招生的，在60個人當中只有3個是英文中學畢業的，其他全都是中文中學畢業生，而當時尚未有中文中學畢業會考，所以當時的中文中學的同學是不需要會考證書，只有英文中學的才要。我記得三個同學之中，其中一個就是我，皇仁的，其他兩個我不知道是爲了甚麼原因選一年制的葛師，一個

來自女拔萃、另一個來自庇里羅士。

梁：當時其他的科目，如物理等，是否任由你們用中英文作答？

李：我看到的多是中文試卷，我們那時每一班也有些英文中學的畢業生，直至以後幾年都是，因為我們有英文選科，雖然只是就讀一年時間，經過英文教學法訓練的，畢業後懂得怎樣去教英文，所以一年制的也訓練一批小學英文老師。

梁：司徒先生當時是葛師第一屆，你也提到三間師範同時考試，這算不算是一種聯校招生？

華：對，是一起考試，但是所填的志願是不同的。我記得考完筆試後，大概挑選過一些，然後尚有一次面試，面試要見兩次，第一次由老師接見，第二次就見校長，我記得第一個見的是羅宗熊先生，他在油麻地書院教過我，他就問我為什麼不去考羅師，而來考葛師，我就說我希望快些畢業。他還說我急功近利，假如我對別的老師這樣說，就不會收我了。第二個就見張榮冕校長，他只問幾個很簡單的問題：第一，他問我會考的成績怎樣，我說我有兩個 credit，都是中文的；第二個問題是我想要多少津貼，我當然是提出最低的，僅僅夠自己交通和零用錢，他就立即說好。

李：說到津貼，當時政府為吸引有志當教師的人入讀師範，設有津貼，像我們出身小康之家的，大多分配不到，有的也不過是50元：有些同學曾有工作經驗的，或有100元、120元。

華：還不止此，我記得我那一屆有幾個同學曾工作過，而且是已經教過書了，但未有檢定資格。他們最高的津貼是280元，相等於政府文員的薪金，讓他們一進來就可領得政府文員的薪金，而最低的只有50元。

李：我覺得這個資助在當年生活困苦的年代是很有幫助的，同學都能夠專心地接受師範訓練。

梁：剛才提到了鄉師，後來鄉師是併入葛師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合併計劃呢？而鄉師所扮演的角色是甚麼？在課程上各方面又是否能融在一起？

李：葛師與鄉師的合併是十分自然而融洽的，因為鄉師大概比我們早十年就開始設立，而畢業的同學大多在鄉村教書，政府在 53-54 年就把鄉師所收到 25 人，加上我們本身 100 人，合起來 120 人，就在加士居道的校舍受訓。雖然

當時是一所新校舍，但設備簡單，只有一個禮堂、兩三個大講室、一個示範室、數個教師休息室而已。鄉師同學雖然只有 20 多人，有男有女，政府還是租用了加士居道旁的一個小洋房，這小洋房很雅緻，有草地，有大小臥室，也有相當設備。男生住樓下，女生住樓上，當時主要讓鄉師的同學居住，那時我在油麻地居住，距離很近，間中會去「騷擾」宿生，找他們聊天、討論問題，所以我雖然不在宿舍居住，但也對宿舍生活略知一二的。舍監是葉梁寶祿女士，是一位非常精明、嚴謹的好老師，她的英文非常好，擔任英文、教育、社會科。

華：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記錯，在合併之前，鄉師基本上有兩個特點：一是他們畢業後要在鄉村任教，不能在市區任教的，當時市區的津貼小學很少；第二它的報考資格不一定要高中畢業。

李：說到葉梁寶祿女士，她是社監也講教育課，十分著重品德訓練，喜歡訓話，一說就差不多是半個鐘，說舉止禮貌、對學生關係、談做人態度，甚至是走路、飲食、儀表、說英文如何才流利得體，巨細無遺。說到穿衣服，那些女同學的裙是沒有開衩的，摺幅裁成。說不定教院的那些舍堂還有這些校友捐出的舊衣服掛在那裡。

華：她（註：葉梁寶祿女士）父親是一個在民國初期很有名的官員，曾任駐莫斯科大使。她好像是在莫斯科出生的，父親是在唐紹虞手下做事...你知道唐是誰嗎？

李：外交部長。

華：她後來就留學英國。

李：她生活嚴謹，一直工作了十幾年，退休後離開了香港一段時間，她的訓勉做成葛師一種非常純正的校風，往後校方的管理、訓導也依着這個宗旨去做。

華：她很嚴格，那時女同學的校服是長衫，她規定那長衫的開衩要開在低處，不能開得太高。

李：那長衫側邊有褶，沒有開衩。

梁：我們就換另一個話題。司徒先生是第一屆一年制，李先生是兩年制，不，也是一年制的。一年當中的課程已經十分緊密了，畢業之後出來教書，能學以致用嗎？感覺如何？

華：我覺得即使讀十年、一百年，都不能完全滿足到你教學時所需要的知識。不過在師範學院總會學到兩道板斧的，就如課室管理、發問技巧這些基本原則。我覺得從事教育，正如我剛才所說「教然後知困」，在教學過程當中，即使你以前讀過多少東西，你也會發現認識得不夠。其實我覺得在師範學院中，最重要的並不是知識，首先要培養起在讀的同學對教學工作的認識、對教育事業的熱誠。要做一個好教師，基本上有三個條件：第一要有教育熱誠；第二要掌握教學方法；第三才是對所教本科的知識。而我覺得所教的本科知識是最不重要的，首先要有教育熱誠，然後你會探求一個教好學生的方法，當有了方法的時候，你才把自己的本科知識教給學生。我經常都說教中文不需要認識甲骨文的；教數學也不需要精通微積分；教英文的也不用背熟莎士比亞。是從最簡單的東西學起，有時你認為是很容易、學生問起的東西你也未必會知道。我初出來教書時也碰上幾個問題，學生問我，我是不知道的，我要回去研究。其中一個問題是：「初」字，初中的初字，學生問為什麼是兩點，從「衣」字部，因為「衣」和「示」是有分別的，為什麼是要從「衣」呢？第二個問題是：為什麼二月份的日子最少，只有 28 日，其他的月份不是 30 日就是 31 日。第三個問題：當時人造衛星升上天，我就向學生介紹人造衛星如何升上天空、如何以每秒 8 公里運行便可抵抗地心吸力，當人造衛星進入軌道後，火箭便會掉下來。學生問，會不會砸到地球上的人？我說不會，因為經過大氣層的時候，它會被焚化掉。那學生就問，為什麼上去的時候不會焚化，掉下來的時候才會焚化？我也要回來看幾本書才懂得會回答這個問題。有一個問題，我相信你們每位都會分數，分數的除法，是把除號改為乘號，後面的就是分母變分子，分子變分母，為什麼？為什麼要這樣計算才可以？道理在哪裡？你能夠解釋嗎？我看你是不容易解答的。譬如這些問題，一方面你要自己繼續去探討，探討以後要有一個較好方法，向學生解釋。譬如分數的除法，大概是在四年級的時候學的吧，你如何清楚、顯淺地教會他們，這些不一定在學院學得到的。

梁：聽你這樣說，其實應該要教很多科了。

華：我們不是看要教多少科，而是看有沒有書可教。學校聘用你以後，看有甚麼科目缺人，你就得講課，當時我們第一屆沒有中英文系之分，全都教中文，只有選科，即是圖工音體，你選那個術科，你到了學校就教那一科的，同時學校多是跟術科去聘請的，因為其他科目是「一腳踢」的，甚麼科都要教。

李：我想這是一年制師範訓練的目標，我們當年一般科目包括教育理論、教育心理、教學法等，中文教學法一定講、數學教學法一定講、自然科教學法也一定講，讓他們可以擔任中文、英文、健教、社會、自然等必修科，其他的便

是選修科，很少會選修兩科的。包括美術、手工、音樂，英文也屬選科，還有 Nature Study。

華：我是科科都教過的，一年級至六年級都教過，同時你們想像不到，我初出來的時候，第一年教書是教甚麼？我教的是英文，因為那一間學校，政府派了一個葡萄牙籍的女老師去教，但校長不喜歡她是外籍人，所以就推辭了。而我當時接到管津貼學校的鄧志強先生通知，叫我下晝去上工，接替這位老師，也不需要去見工，因為這間學校的校長曾教過我，認得我的。他曾任官校的老師，退休以後去當津貼學校的校長。我去到以後就教三、四年級的英文，但之後一位學校教英文的同事離開，教育署官員一個親戚是教英文的，要進來教，那沒辦法，就把我編到教一年級。

梁：你教哪一間？

華：我教的是紅磡街坊公立學校。

梁：是津貼學校？

華：是的，當時是在市區內唯一的兩間津貼小學，一間是紅磡街坊公立學校，專收九龍船塢的工人子弟；另一間是太古漢文小學，專收太古船塢的工人子弟。我除了教美術外，我還教過體育和音樂的，為什麼呢？當時還是年輕，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」，當時一到實習時間，有很多師範學院的同學來代課，使我一週之中，有一天幾乎是完全沒課要上的，而我看到校內有些同事沒有人替他代課，我就說替他上這一堂課吧，而上體育、音樂科是最沒有影響的，那就代了幾課，獲得一些難得的經驗。

李：當時英文的選科是很吃香的，因為很多學校都需要英文老師，而且英文課課節很多。一個老師只能教兩班的，而且小學急速擴展，需要很多英文老師，由於英文選科吃香，人手不足時，如果是英文中學畢業，又能寫會說，也可能暫准他們去教英文。音樂科也是很吃香的，因為音樂科老師的挑選較嚴格些，要會鋼琴，達到某個級數，即使是不會的，也趕急去學習，於是迅速培養一批音樂教師。而其他各科相對不太吃香了。

華：當時的教育司署規定了老師教英文的資格，假如出身自中文中學，英文科要合格，像我一些英文書院畢業的就一定可以教了。

梁：那體育和音樂教師的資歷有沒有規定的？

華：選讀之前，老師會考核一下，譬如你欲選音樂，就聽你唱歌、彈琴；體育科就要你表演一下跳高、跳遠等。我選美術就比較簡單，叫你畫一幅速寫就可以了。

李：都是很簡單的測試。我想說一下在 54 年開始，一個校舍作兩個校舍的使用，即是上下午班的開始，一直有十多廿年的時間，那時我們班中的同學有些年紀稍大，有些已有工作經驗，而年輕的也有很多。在 54 年開始到 57、8 年，當時一些同學教書幾年，便選擇去外國讀書，很有上進心，有的試讀過一兩個月後覺得不適合便轉學，當然更多是繼續受訓的。畢業後多只教一畫的書，下畫去進修的很多，他們自己去進修英文、中文或其他科目，甚至有些讀好英文然後去考倫大校外考試、投考港大、或在晚上修讀文商夜學院，可能是為了培養自己有較好的學識，裝備自己，增值自己。所以我們的校友成份複雜，有畢業後做老師，有的教了幾年便到大學讀書，有的取得很高的學位進入大學教書，不過從事教育工作的還是最多，因為生活比較穩定。

華：當時的分別是這樣的：讀一年制畢業出來的叫小學教師 PSM，Primary School Master。兩年制出來的，就是檢定教師 CM，Certificate Master，那 PSM 和 CM 有甚麼分別呢？我們這些一年制的，到 7 年就升到頂點了，同時是沒有資格升 AM 的。但是檢定教師，即文憑教師還可以升 AM、SAM。所以很多人去讀文商，那是為的什麼呢？在讀完文商三年之後，你可以由 PSM 轉為 CM，所以當時在文商夜校修讀的幾乎都是師範生，那些一年制的師範生。

梁：你們兩位有沒有讀文商呢？

華：有，不過我很遲才去讀。我是在 1968 年才去讀，我讀完之後已經不需要這個資格也可以升職。

梁：話說回來，現在在小學裡也有 APSM。

李：這是新名。

梁：而且是 Degree Holder 才叫 APSM。

李：其實讀書進修並不是我們唯一的想法，培養自己的學識才是最重要的。因為在 55-60 年以後畢業生多在津貼學校服務，津貼學校很少升校長為 AM 的。像司徒先生在津貼學校當校長，也不過給他一些津貼，並沒有其他升級機會。所以當時在津貼學校的 PSM 去讀書，真是志在讀書、進修，在文商夜校最為普遍。

華：我在 1961 年當校長，當時已是 PSM 的頂點，多年也沒有加人工，當校長也沒有，只有百多塊錢的校長津貼，一直到我 68 年在文商讀了三年，在 71 年畢業，但那時不需要 CM 也可以了。

李：因為校長職位已經是 AM 了，當然還得看有多少班。

英：不好意思，我想問一下，因為司徒先生提過，最重要的是教學熱誠和教學技巧，那可不可以說一下你們當時讀書的時候，老師是否都可以給你們這一方面的啟發？

華：你指的是教我們的老師？是指在中小學還是在師範學院？

英：在師範學院。

華：有一些吧，我也不想批評個別的人。

李：我的想法是一個廿歲左右青年，初初投身教育行業，總覺得這些訓練是和我們在中學讀書的形式很不同。它給我們一些教學技巧、基礎理論，我們都明白一定要繼續進修，才能應付需要，教好學生。一年的時間很短，上學期四星期的實習教學，很感興奮，因為可以去教人了，只有幾道板斧便去教人，回來以後再進修、檢討，藉示範教學觀摩，看看那裡好、那裡不好，自己想一下怎樣做。到了第二次，即在下半年，便有六個星期做第二次實習，多數可編配到另一所學校，面對新的學生、新的面孔，回校後又作檢討，繼續各種技巧的訓練，那就過了一年時光。

華：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張榮冕校長，他是一個很寬容的人，同時也是一個很開放的人，他一方面很支持我們的課外活動，我們學生會成立就已經演出一齣戲——《佳偶天成》，而且在假期，他又會邀請我們到他家燒烤。他對同學的態度很寬容，同時他設了一科叫「藝術欣賞」是他親自授課的，我印象最深就是他在課上介紹了兩本書：第一本就是錢鍾書的《圍城》，第二本就是朱自清的一本說文學理論的名篇《論雅俗共賞》。直到現在，我還記得。那次介紹是我第一次聽到錢鍾書的名字。

李：我補充一下那個所謂欣賞課，是音樂欣賞與美術欣賞，隔週交替。那是對一個教師的本質修養、一個教師的知識擴闊、對於投身教育行業、對於人才培育在素質方面的要求。當時教美術的何漆園先生，拿出他若干作品給我們看，教我們怎樣去欣賞...

華：是當場畫給我們看。

李：教音樂的是鄭蘊檀老師，介紹樂曲、樂器、甚麼音樂表達甚麼意思，對當時比較死板的中學學習形式來說，是一種較新的素材。

華：同時我想張校長非常喜歡王爾德的作品，所以我們校友會數次的演出都由他提議演王爾德的戲。第一齣是《少奶奶的扇子》、第二齣是《可敬的葛靈敦》、第三齣是《理想的丈夫》。但準備第三齣時，他已經離職了，而當時的校長又不贊成我們去演，所以排練了很久都沒有上演這齣戲。

李：我相信演戲是一種學習手段、學習方法，所以叫學生演戲，又叫畢業生回來幫手做後台工作、聯繫工作等，加深同學的認識、了解、增進投身教育的興趣，都很有幫助，那幾年我們大家都很年輕，學問不足，但憑著互相鼓勵，透過戲劇做到聯繫、學習的效果。

華：我們當時是一年制，照理我們應該只認識本屆的同學，但是我跟幾屆的同學都很稔熟，都是因為透過戲劇，參加校友活動而互相認識。我覺得戲劇活動是一種很重要的教學手段，不單是那些演員，戲劇是講求合作配合的一種活動。我記得我是沒有演戲的，當第一次做《少奶奶的扇子》的時候，我是幹甚麼的？我是當「場記」。你們知道甚麼是「場記」？就是躲在布幕後面，要在演員忘了台詞時，我們就去提醒他們，同時也會叫人出場的。

李：那是「提場」。

華：那是提場、場記。到第二次演《可敬的葛靈敦》，我是做前台，專是負責推銷門票等等。這些工作是對一個人的工作能力有所鍛鍊的。

梁：剛巧我昨天有幸認識馮源先生，以及馮太 — 莫紉蘭。她說戲劇在教學上是很重要的，特別是在教語文的時候，那些表達、如何準確地把訊息表達出來。也正如司徒先生所提到的場記，是一種幫助教師的工作。

又是一個跟進的問題，關於校友會的，羅師校友會和葛師校友會，也是有很多在戲劇方面的活動，也在很多時候利用戲劇去籌款。那我想問兩個問題：第一個是戲劇在當年是不是一個很受歡迎的活動？第二個問題是校友會是在甚麼時候成立？為什麼會成立？

華：如果說到戲劇，羅師比我們活躍，因為李援華先生在那裡教書，他曾大力推

動。我們只有剛才提到的那幾個演出，我們演第一齣《少奶奶的扇子》是因為我們開了一間夜校，在循道小學利用晚上的時間開一間夜校，目的就是籌款。到第二次就是為開辦我們自己的學校而籌款。其實我們葛師也不是特別注重戲劇，所演的也不過是我剛才提到的幾齣，除此以外也沒有甚麼其他的活動。同時，活動也不是先由校友會鼓吹，而是張校長鼓吹，校友會自然組織起來。

李：我可以補充的是，教育這個行業是對人的關係、是下一代的關係、也是人際關係，而人際關係是要通過活動才能達到。據我所知學院開學不久，先安排一個星期的交誼活動。我們在註冊之後不用上學，就分成幾組，有時候是兩三類不同的組織，分別搞一些節目來，說幾句話、做一些介紹、玩幾個遊戲等，讓大家變得熟絡。這是我們與中小學生，甚至是家長的一種溝通技巧。另外就是講故事，為要表達自己，向人解釋，這些訓練也要做一整個星期的。講故事分成若干組，每組二、三十人，站出來說話，輪流說自己喜歡的故事，看在這幾分鐘內，說得好不好，這也是一項教書的必備條件，好像字音正確、表達方法、故事題材等。所以聯誼活動和講故事是作為每年最先的兩個活動。往後就進入學習軌道，修讀理論、探求手法等。

華：我記得在早幾屆，特別是張榮冕校長當校長的時候，每一屆開始的頭一個星期就是聯誼週，就是把同學分成很多個小組，每個小組要負責一個節目，出來表演。李百強那一屆的聯誼週我也有去看過，你所演的，我記得是《西廂待月》中的女孩子，是不是？

李：我記不起了。

華：我的記性蠻不錯的，這個聯誼週是讓同學通過活動而熟識，同時鍛鍊他們的工作能力，我覺得這種做法很好。那我不知道後來還有沒有，以我所記得我們說故事不是在聯誼週的，當時胡熙德講教學法，有一堂主題是說故事的技巧。說完以後，他說叫我們同學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紙上，摺好以後放在灰箱子內，他抽到誰，誰就要出來說，我看他也是戲弄我，他叫我第一個出來說故事。我記得我當時說的是《皇帝的新衣》。

梁：題材是你自定的。

華：任由你說甚麼，當抽到我的時候，我想我最熟悉的就是《皇帝的新衣》，那我就這個故事。

梁：你們說到這些聯誼活動，李先生是第三屆的，而你是第一屆的，已經畢業了，

但你都會去參加的？

華：有時有活動我們都會回去看的。

梁：所以覺得很在乎你們這些校友的心意。

華：在這裡我想說一下，羅師和葛師在風格上有甚麼不同。我記得有一次不知道是甚麼宴會，有些人問我們，兩間的作風有甚麼不同？我當時說得很簡單：羅師的畢業後做官多，你會看見很多高官都是羅師的，我們葛師的學者多，當教授講師的，這就是分別了。後來有一個人說我們還有一點不同的是，我問是甚麼，我們葛師有立法會議員，但他們沒有。我想當時葛師的士氣是很好的，因為羅師是兩年制，我們是一年制，我們好像被別人小看的，所以我們的同學是相當發憤。工作教學固然努力，另外有很多在工作儲到錢後再去讀大學。譬如：趙令揚，還有一位跟他一起在港大教的...

梁：何沛雄。

華：何沛雄、杜祖貽、江潤勳，我們有很多同學都是儲到錢再到大學讀書，所以葛師出身的學者比較多。

梁：這不同的風格，我也能體會到一點。其實很想問一下，在 70 年代，有人說教師在當時比較敢言，當時有教師集體行動，權益運動，直到成立教協，這個歷程你又可否分享一下？

華：教協的成立，有其歷史背景。所謂教師變得敢言，都是在教協成立之後的事。在 70 年代初，當時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社會背景呢？第一，香港的政壇都是左右兩派所控制，特別是團體和工會，不是台灣的國民黨，就是大陸的共產黨。但是在 70 年代初的特點是：第一、中國大陸因文化大革命變得一團糟，我看已經無暇顧及香港；第二、左派在 67 年發動暴動，深受打擊，失去民心，所以在 70 年代初他們已經是龜縮了。我在報紙上也寫過，當我領導文憑教師事件時，新華社派人來叫我不搞。而國民黨亦都龜縮在台灣，當時好似是受到了被聯合國驅逐的打擊，亦是收縮了。所以左右兩派的勢力都不活躍，這是當時的政治因素。其次是 97 問題顯露，因為再過不了多少年就要回歸了。香港人以前是沒有歸屬感，沒有本土意識的，所有將來和希望都寄託在大陸，中國好，香港就會好。但當時由於 97 問題的出現，由於台灣、大陸的情況也開始有本土意識的出現。所以在 70 年代初形成了一些壓力團體。同時也有獨立的工會。73 年文憑教師事件時，教協還沒成立，當時政府因為準備有一個十年發展官校計劃，要擴充官立小學，但它又不想多拿錢出

來，便減少文憑教師的人工，當時是把文憑教師的起薪點減了兩點，而頂薪是加兩元。這件事是對在職的老師沒有影響的，只是對師範生有影響，因為一畢業便被減人工了。為這事而最先發難的是師範學院的學生，但學生辦事畢竟幼稚馬虎，他們原先說要在考畢業試時發動罷課不去考試，但學校一說不考畢業試，便沒有畢業證書，將來不可以教書，那就全都投降，學生會也解散。而第二個接棒的是官校教師，為什麼官校教師會加入呢？是因為他們看到護士，一向以來都是同薪酬的，而護士不單止不減薪，而且在頂薪點加兩個 Increment，所以他們不滿，舉行了示威、請願、貼大字報，但政府不讓步，他們也退縮了。當師範學院學生、官校老師都失敗，我才出來的，當時我認為光是師範學學生不行、光是官校老師也不行，是要官津補的老師都團結才行。當時就組織起十三個團體的聯合祕書處，當時包括了各學校的校友會，羅師、葛師、柏師、鄉師、漢師等等，這樣才可以發動起全部的老師。經過這次事件取得勝利後，我們才成立教協，其實在這事件之前，我們已經爭取成為工會，但政府壓住不予批准，我們在 72 年初已經申請成立工會，但政府不批准，直到文憑教師事件解決之後，到 73 年 8 月才批准我們成立工會。但當時雖然並未成立工會，但我看看當時職工會的法例，籌備委員會也可以宣佈罷工的，同時籌備委員會沒有限定人數，所以我當時四處呼籲老師出任籌備委員，我看沒有一個工會團體有這麼多籌備委員，我們有五千個籌備委員。當時透個這些籌備委員去把老師發動起來。

梁：當時司徒先生成立一個工會，你的理念是甚麼？

華：在教協成立開始，我就為教協定性：第一，它是一個工會，工會最重要的是保障及爭取會員的權益，為會員謀福利，這是第一點。第二，教協是教育團體，它的成員全都是教師、從事教育工作的，所以它要關注教育事業，同時對推動教育起積極的作用。第三，它是一個民間團體，民間團體和官方團體是對立的，它是站在社會大多數人的一邊，是支持公義，所以教協一直是支持民主。這三點在教協成立時，為其性質作出一個定位。

梁：教協和葛師校友會，是否可以令師道承傳下去？

華：我覺得師道承傳是要靠各方面的，要靠教育學院、要靠教師工會，至於校友會來說，我覺得它的功效逐漸衰微。我們校友會在我當主席的時候，活動是相當多的，我們每年都有夏令營，一年有很多的活動，甚至現在工會有很多的活動都是在校友會時間辦的。我相信香港這麼多團體舉辦台灣旅行團的，我們葛師是第一間。當時李先生也有帶團到歐洲的，我們每年也有幾次新界一日遊，每年都有聖誕舞會。但是在教協成立之後，我覺得是要讓路給工會，它的人力龐大、資源豐富，同時聯絡到的人比我們更加多。所以教協成立以

後，我們便放棄了搞這些活動，我們現在一年只搞兩個活動，一個就是春季的聚餐，另一個是秋季旅行，所搞別的活動都沒有辦法與教協相比。不過葛師校友會對教協的成立是很有幫助的，在教協成立之前，即 73 年文憑教師事件之前，我們葛師校友會是非常活躍的，我們已經有每間學校的通訊員，即是現在的「代表」，當時已經有出會刊發到各學校去，教協的成立之前，在 73 年的罷課事件中，我們的通訊員差不多是教協在每間學校的「代表」，起到一個發動的作用。教協成立之後，做事始終要看時勢的，所以都讓路給工會去搞，我們現在每年只搞兩次活動。

梁：我很欣賞校友會的貢獻有這麼大，特別在興辦學校方面。

華：我們興辦過五間學校，最早就是我做校長的觀塘，第二間是慈雲山，第三間是油塘，第四間是將軍澳，現在全都被殺了，只剩下黃埔的一間。在被殺校期間，我曾經說過，當教育未曾普及的時候，我們出錢出力興辦學校，是義不容辭的，我們盡了歷史責任。當學校開了這麼多，要殺校的時候，那就殺吧！沒所謂的。我記得我在 2004 年不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，香港有一位富商找我，說要捐三千萬給我，叫我開一間司徒華學校。我即時拒絕，我說我不喜歡這樣，現在學校已經太多了，再開學校豈不是加速殺校的趨勢？當時一口拒絕了他，我們辦學不為甚麼，就在教育不普及的時候，我們作為教師組織，就有一份責任為普及教育出一分力。同時我們不求成名，甚至不想成為名校，我們學校貫徹有教無類的方針。

李：可以補充的是，我們校友會辦學的宗旨是回饋社會，我們既然從事教育行業，當然希望香港教育蓬勃發展，既然學生沒有讀書機會，我們就辦學校。起初在徙置區樓下開辦，後來 6、70 年代政府有獨立校舍，我們才提出申請，得到批准，然後擴展辦學，吸收了一些葛師校友做教師，出自其他師範學院的也從不計較。

華：再補充一句，在回歸之後特區政府之下，它不再批准我們辦學。我們以前開了這麼多學校，有辦學的經驗，同時我們所有的會員都是教師，很熟悉教育。但是回歸以後，年年我們申請開辦學校都不獲批准。但你會看到一些完全沒有辦學經驗的，就批准他們辦完小學，又辦中學，你可以看到當中的政治傾向。

梁：在這個環境之下，其歷史任務已經完結，那校友會的角色會怎樣走下去呢？

華：在校友會方面，主要是聯絡校友之間的感情，也不需要這麼多活動。而以這個團體的性質，我們的人力物力，也不容許搞這麼多活動。至於教協，我們

要促進教育的健康發展，監察政府的教育政策。大家都看到現在香港的教育政策是亂七八糟的，有口號無措施，亂搬外國經驗，不了解實際情況，在這一方面校友會在教育上的聲音已經不是這麼強大，但我們會支持教協對政府教育政策的監察。

李：說到有教無類，確是事實。在徙置區辦學當然有不少家庭的子弟來讀書。目前僅存的黃埔學校，這十幾年來也接納了很多外地移民，不論他們是甚麼程度，稍為超齡的都讓他們試讀，減少限制，多付愛心，所以很受這一類家長歡迎。

華：你們記不記得，當時有一批學生在大陸來的，是新移民子弟，政府不讓學校收他們，要把他們遣送回去。除了陳日君主教宣佈幾間天主教學校收他們之外，我們葛師也是第一時間宣佈願意收容他們。我們頂着政府，有些人反叫他們去告我們的。

梁：所以我覺得校友會對社會回饋是應受社會尊敬的。雖然在功能上可以被校友會（註：應該是指教協）漸漸取代，但它的付出是不可抹煞的。

李：主要問題在我們沒有甚麼複雜目的，我們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專業。我們又希望香港學生都能夠有書讀，我們辦學不設門檻，肯收最窮困的學生，我們學校附近有不少名校。但我們從不與別人爭，不理他們做甚麼宣傳，我們都只是艱苦地耕耘。近年，我們黃埔學校都逐漸縮班，但不要緊，有多少學生就教多少。

華：從一些很小的事情都看到我們葛師的作風與羅師不同，羅師只開辦一間，自建校舍，我們都不是。我們開辦了這麼多間，用徙置區的樓下、公共屋邨的校舍，及後開辦了五間學校。

李：依次因重建屋邨、收生不足而結束。

華：它（註：羅師開辦的學校）都被殺了，比我們更早。在這方面可見作風的不同。

英：我相問一下關於中文教育方面的問題，早期政府是不是不太重視中文教育？或者葛師的老師會怎麼看？

華：重視中文教育，我在 73 年文憑教師罷課事件已經提出了。首先，為什麼要用母語教學呢？你要先了解教育是甚麼，教育最重要的是甚麼？教育不單是

學好一種語文，我曾經說過「學好英文和用英文去學各科是兩回事。」我們用母語進行教學，學生容易明白、師生關係良好、容易溝通。同時亦是承繼我們國家文化傳統的一個方法，英語雖是重要，那就去學好英語這種語文，其他各樣科目是否都要用英語去教？在這方面，我自己有切身的感受，因為我讀皇仁，它是全英語教學，我自己覺得特別在上數理化這一類科目，老師用英文解釋，同學花上十分鐘都不明白，因為言語溝通的問題。但用廣東話來解釋，三分鐘就明白了。當時我們皇仁這麼有名的英文中學，我們很多科目都是用英文課本，不用中文來教。所以母語教學的理念應是從教育的目的和宗旨去出發的。

劉：想跟進一下校友會的情況，你是在 1968 年當校友會主席，而不是從成立開始就擔任這個角色呢？

華：在第一屆，我不會當主席，是任副主席，因當時校友會只有我們一屆人，很少人的。但後來因事忙未有參加校友會的工作，但校友會的活動，我多有參加的，譬如每年的夏令營我都有負責籌備的。我記得有一次的夏令營是在長洲舉行的，我還負責向喇沙中學的宿舍借了很多床褥，讓我們的同學睡在地上。每一次的校友會活動我都有參加、支持，但沒有掛名當上甚麼委員。一直到 68 年後，因為有其他原因，我才當上主席。

劉：是甚麼因素呢？

華：因為當時校友會的負責人對我的辦事作風有偏見，我想倒不如由我參選，靠校友的投票來支持出任。

劉：那擔當主席之後，在運作上有沒有甚麼轉變？

華：沒有，我剛才也說過，我擔當的時候是非常活躍的。我們舉辦本地的旅遊、海外的旅遊、出版刊物等等，一直到 73 年教協成立，工會的人力資源比我們更多時，我們的活動才不那麼活躍。所以現在校友會收會員也只是收永久會員，只要 50 元就可以成為永久會員。因為收會費也很浪費時間的，我們的資源又不夠，發一次信給各校友，工作量很大了。譬如現在我們校友會活動訊息的發佈都是靠教協報的，我們沒辦法自己再發信。

李：說到校友會辦學，是需資金的，都靠校友捐錢出來，我們選擇把屬校賺的書簿費儲起來...使有足夠的資源以支持辦學。亦不計較它是被殺還是甚麼原因，好像在上年度 2008 年 8 月底結束了兩間學校，都是因為學生不足，一間是觀塘學校，即司徒先生擔任校長的一間，在 1961 年開辦到 2008 年結束；

另一間是將軍澳學校大概在 1989 年開辦，又是因為學生不足而結束。我們把兩校校產給會計師核數後，便撥回我們的教育發展基金，現在存有二百多萬，這數目雖然不算小，但目前情況也不能有甚麼作為。

劉：同學畢業以後是不是多數都會加入校友會的？

李：隨便的，通常是有向心力的那些校友。我們初時只是一個聯誼社團，向警務署註冊便可。後來要申辦學校，必需成立一個法團，所以我們組織有限公司，每年向公司註冊處及有關部門申報資料，提交帳目予會計師審核，我們今年 3 月 22 日開周年大會，每年一次，大會中就有畢業 50 年的同學參加，有些 20 歲出來教書，現在也差不多退休了，他們一心想過退休生活，喜歡與舊同學見面，於是有 40 重聚，有金禧慶祝。今年是 59 年畢業那班校友，他們聯絡得很好，二百多人中也有六十人說要報名參加聚餐，我們也邀請一些當年老師、校友、同學歡聚，今年準備設十多二十圍了。

華：我覺得有一樣與你們教育學院十分不同的是，我們校友的認同感很強，有時我們碰面都會說，我是葛師的，在甚麼年畢業。但我相信你們的同學不會這樣的。

李：這是個時勢問題，因為當時受了一年訓練，出來教書，艱苦地開始自己的事業、家庭。有的出來工作，都在得來不易、受訓不易、教書不易的環境下成長。

梁：司徒先生說得很對，你們是緊密很多。需要一個團體去維繫當中的情誼。

華：也需要看你怎樣去工作，譬如教協，你看全香港有哪一個工會像教協那樣？我們人數最多，我每次到會都看我們的會員人數，我們徵收會員是由 9 月 1 日到 8 月 31 日，由上年的 9 月 1 日截至今日為止，已交會費的有八萬一千八百多人。我們白手興家，我們自置會所的面積是四萬多平方英尺，我們聘請的受薪職員有一百八十多人，其中是有大道理的。為什麼可以發展成這樣的工會？

梁：如你所說是在 70 年代開始.....

華：我們在 73 年罷課的時候是籌備委員會，73 年以後就正式批准我們，到 74 年 3 月底才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，才選出第一屆的理事。

梁：最初是不是在渡船街那邊？

華：那邊最初是借勞資顧問委員會的地方，後來到罷課成功，我們發起「爭益金」「爭取權益基金」，有兩個目的：第一是保障教師的職業，假如被秋後算賬，我們會為他們爭取的；第二就是準備購置我們的會所，但購置會所不是教協的，因為當時的錢是十三個團體籌來的。我們當時籌到 80 多萬，但我們當時不能立即買會所，因為三間教育學院的學生會都是極左思想，他們從中作梗，使我們交了三年租，為什麼呢？因為要做註冊有限公司才可置物業，我們以聯合秘書處註冊時，學生會說不行，因為註冊條例第一條說明這公司「in this colony」，他們不承認香港是 colony，他們反對，他們是十三個團體當中的三個，那我們為避免決裂，也遷就了他們，就租了文英樓的一個地方，月租三千元，租了三年。一直到國粹派垮台，學生會換了人，他們才同意我們註冊有限公司，我們才買了文景樓的地方，文景樓當時都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買來的，買了兩個單位，現在還在。到後來教協逐漸成長，就自己購買會所。這裡(好望角大廈)是 88 年買下的，但買這裡之前已經在北角購買了會所，在地鐵站樓上，後來賣掉北角會所就搬到銅鑼灣去。那發展過程是這樣的，教協去年的盈餘是 920 萬，今年因為金融海嘯影響，我昨晚才看過年結，今年好像是 678 萬。

李：我說一下校友會的主要工作，包括兩方面，一是學術，另一是聯誼。在學術方面，各人各自奮發求學，因為香港、海外仍有很多進修機會，研討會則由大團體來做，所以我們主要做聯誼工作。大家都很珍惜往日情誼，大家也想不到教書工作一直維持至退休，雖然有的中途轉業，也難得四十年、五十年後的相聚。除了同班小規模的定期約會外，每年周年大會也有很多校友去參加，大家都緬懷過去幾十年在學院讀書的境況，大家各自在教育崗位上努力一番，現在又交換一下退休心得，也是蠻有意思的。

梁：我覺得你們雖然已經退休，但是心還沒休。也有問題想請教兩位個人方面的，大家都是學而優則教，司徒先生教而優則議，去了當議員；李先生就教而優則考，在考評局工作。也想請問兩位在教育的工作，你怎麼能夠貢獻予你一生的工作呢？

華：你說到我做議員，我這陣子也想到我一生做過的事，我是把議員放到最後、最不起作用的。第一，是 73 年的文憑教師事件，抗爭勝利，然後成立教協，其實創業不易，守業更難。73 年的文憑教師事件抗爭勝利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怎樣發展成為今天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第二件事就是支聯會，已經做了二十年，支聯會的工作更加複雜、壓力更大，我是堅持了二十年。第三，我教了四十年書，我自己覺得亦被人認為是一位好老師、好校長。第四，我寫了很多文章，我結集出了十七本書，每一篇我都很花心機去寫的。至於立法會議員，我是放得很低的位置，我覺得在這方面是我最厭惡的工作，所以我第

一樣不做的就是立法會議員。而教書的工作，對我來說，教育是人的事業。與其他工作不同，其他工作可能是對事、對物，對各樣事情，建築工人面對的是水泥、磚瓦；會計師面對的是數字；雖然醫生面對的是人，但他是面對人的病，比較少注意人；教師面對學生，學生是人，人最複雜，可塑性亦最大，所以教師是面對人的工作，而要做好人的工作需要甚麼呢？我從來都強調兩樣東西：一是愛心，一是耐心。假如你沒有愛人之心，你沒辦法教好你的好學生，你對學生要有愛心。第二，要有耐心，因為人的轉變是要有一個過程，我看到不少學生，在讀書的時候很頑皮，但長大後很生性，你在現在播下的種子你可能在日後才看到他發芽，你不要因為當時看不到種子發芽，你就灰心。我剛剛寫完一個故事是佛經來的：有一位小和尚，看到寺門前有一幅空地，覺得空着可惜，便問師傅好不好種一些東西，師傅說好，那就準備種子等春天來。到春天來了，小和尚問，現在可以種了沒有，師傅說可以，「隨時」，要跟着時間。但一播種後，一陣風吹來，把很多種子吹走。那他就告訴師傅，吹走了很多種子，師傅說不要緊，吹走的種子多是空的，要不然它是吹不走的，師傅就說「隨往」，任由它去。沒多久，有雀鳥來啄那些種子，小和尚又去告訴師傅，師傅說「隨遇」，它們的遭遇如何就由他吧。後來又下一陣大雨，把很多種子沖走了，小和尚又告訴師傅，師傅說「隨緣」吧。後來門前的種子尚有一些剩下來，長出了綠草，小和尚很高興，告訴師傅，師傅說不要只是看到門前的就高興，你要到附近看看，到山下的小溪看看，到山下的平原看看。他一看，原來那裡都長滿了綠草。原來被風被水帶走的種子，有的在小溪旁發芽，有的在山下平原發芽。師傅就說，這就是「隨喜」。人的發展也是講求很多遭遇，你對學生的教導也像小和尚撒種子，盡力的去做，可能他今天不開花，但明天開花，不在你眼前開花，卻在他自己的心裡開花，盡自己的能力去工作。同時這也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工作，因為人是很有意思的，社會好不好就是靠人。我很喜歡羅曼·羅蘭的一本長篇小說的最後一段《約翰克里斯朵夫》，最後一段是說聖者約翰克里斯朵夫，托著一個小孩子過河，很艱苦的去到對岸，克里斯朵夫問那個小孩子，你這麼重，你究竟是誰呢？在傳說當中，這小孩子是耶穌，但在故事中他沒有說明，那小孩子只是回答他「我是即將到來的日子」。我們教師也是一樣，我們肩膀上有我們的學生，這些學生也是「即將到來的日子」，他們是影響着將來的社會。這些學生會成為將來社會的棟樑，我們肩膀上也同樣有「即將到來的日子」。

李：司徒先生說到愛心和耐心，我相信有很多教書的朋友都視教書為他們的專業，尊之重之，盡力做好，他們是本着良心，憑着良心去做一位好老師。初時也或有一些馬虎苟且，看到別人教書得過且過，但時日熬練，看到他們能夠過而能改，繼續進步，心裏很高興。我在中小學校教了幾年書，又在師範學院教了十幾年，都在政府工作，我完全感受到不論在小學、中學、大學工

作，也是本着善意良心，為完人教育而奉獻。作為中國人，在香港這個地方、這個年代能為社會做些有意義的工作，教師對維持社會穩定是很重要的，也不光是為個人的生活。

華：我覺得人的工作是分為職業與事業兩種的，職業就是吃飯，賺錢，這是很重要的，如果沒飯吃餓死了就甚麼都沒有。第二就是事業，事業是你的理想寄託所在。在社會上很多工作不是事業、職業雙結合的，但教師是事業、職業雙結合，一方面可以解決你生活的問題，另一方面可以把你的理想寄託在工作上面，是事業、職業緊緊結合的工作。

梁：今天下午的一席話，真是終身受用不盡。謝謝你們接受訪問。